

书人茶话

风华北宋的芸芸众生

■ 易扬

国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有过一句脍炙人口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千年以来，历朝历代、海内外的史学家们几乎都把北宋称之为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根据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记载，北宋人口已经发展到将近一亿，是盛唐时期的1.6倍，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被再次追平；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农桑等各项事业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难怪历史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直言：“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朝堂上的帝王

我们谈论历代君王至高无上的权威时，《诗经》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句子，很难不闪现于脑海；但南宋开国之时，喊出一句“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之后，宋朝皇帝的“地位”似乎就一落千丈，无论是开辟盛世的仁宗、革故鼎新的神宗，还是昏聩亡国的徽宗，虽然远见、秉性、能力等各不不同，但面对纷纷扰扰的朝堂争鸣，全都憋着一肚子说不出的苦水，概而论之就是五个字：“万事不自由”。

这些“万事不自由”的事例，被各类历史书籍津津乐道，也将长久以来被过度神化的帝王们拉回成了“芸芸众生”。在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里，就记录了一则宋仁宗“委屈指数”拉满的片段。有次宋仁宗被台谏官的章疏搞得很不高兴，溜须拍马的官人便问仁宗：“（台谏）所言必行乎？”这一问就立马刺激到了仁宗的痛点，后者满腹牢骚地说：“台谏之言，岂敢不行。”俨然就是一副行事处处受限的孩童形象，可宋仁宗一点人都不糊涂，几天之后，阿谀奉承的官人就被随便安了个由头赶出宫去，仁宗的解释让人肃然起敬：“此人劝我拒谏，岂宜置左右。”可谓明察秋毫、洞若观火。

宋仁宗赋予台谏官们的“风闻奏事”权利，不仅令其自身深受“困扰”，就连他的皇子皇孙们都“苦不堪言”。学者徐富海在其所著的《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中，同样写到了这一段宋神宗的“憋屈往事”。神宗皇帝被台谏官们各种无根无据的“互喷”搞得焦头烂额，但又碍于制度设定无法对其问责，于是便耗费大量精力，去安抚那些受到中伤却又爱耍性子的官员们，在御史中丞王陶对韩琦、曾公亮的弹劾案中，宋神宗疲于奔走在双方之间，“折腾了两个月”，才让他们逐渐消停下来。虽说“风闻奏事”不可避免地滋长了言官们的口舌之战、相互中伤，但倘若用辩证的观点去审视，正如元人脱脱在《宋史》里所说的“宋之立国，元气在合谏”，身处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权力约束和广开言路？

宋徽宗在后代史书中饱受嘲讽，《元史续编》的作者胡铨甚至挖苦“徽宗多能，独不能为君耳”。照理说，无知者无畏，作为朝堂的“甩手掌柜”，宋徽宗理应过得万般自由，可在美国学者伊沛霞的《宋徽宗：天下一人》中，他和列祖列宗一样，也奈何不了那帮整天吵吵闹闹的言官，满肚子都是倒不尽的委屈。为了竭尽全力维护宠臣蔡京，宋徽宗不得不顶住满朝文武的压力，力挽狂澜。但即便如此，也还是无奈地三次贬谪蔡京，并且“每次替代蔡京的都是批评他的人”，可见即便昏庸如徽宗，在与宰臣共治的政治制度下，也还是处处受到掣肘，有着不少摆不平的朝堂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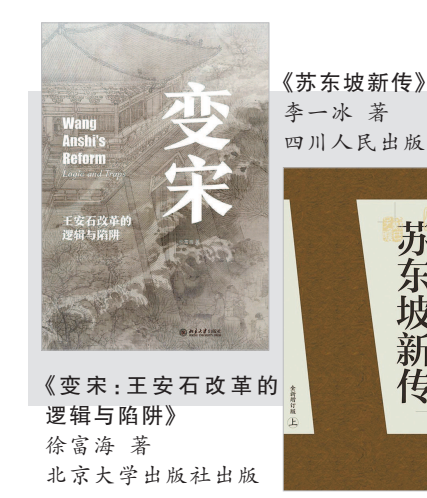
乡野里的臣子

北大教授罗新在其著作《漫长的余生》的扉页，手书过这样一句话：“普通人的故事，才是时代的主流。”令人颇为感怀。学者赵冬梅的《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在论述司马光的成长经历、人生阅历、政治履历之前，先不惜

笔墨地介绍了他那些“以五代衰乱不仕”、一直隐于山林的近世祖先，以及北宋建国后，在司马家族内部逐渐清晰起来的宗族分工——和当时很多出身乡野的宗族一样，他们都试图举全家之力，将那些会念书能考试的孩子，送上光宗耀祖的仕途。以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为例，兄弟三人中，老大司马浩、老二司马池负责读书应举，老二司马浩则扛起耕地畜牧的重担，负责管家养家；然而生活的重担，让司马浩年仅32岁就撒手人寰，于是老大司马浩就放弃读书、接过担子，殚精竭虑培养司马池一人科举入仕、光耀门楣。司马家族的分工故事，在北宋历史上并非孤例，蔡襄、梅询等出身乡野的平民官员，也都是如此走上科举之路。根据相关史料，平民子弟在北宋官员中的占比达到45%，这又何尝不是缔造北宋清明政治的重要基石？

“乡野”不是北宋官员迈入朝堂的人生起锚地，同样也是他们政治受挫时的情绪缓冲地。苏轼40年宦途大起大落，他曾讲过一句“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千年来一直被视为其豪迈旷达的人生写照。事实也确实如此，当后人于苏轼波澜壮阔的一生著书立传时，总是不免谈及他那些游走于乡野之间的平民之交，这其中有些酒监、药师、道士、和尚、琴师、大夫、农夫等等，可谓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在学者李一冰著述的《苏东坡新传》中，多次提到苏轼的一位出身贫贱的同乡至交巢谷，在苏轼被贬黄州时，巢谷奔奔而来，一边充当苏轼孩子们的塾师，一边还亲自为苏家充当家厨；当苏轼再贬儋州，苏辙被贬龙川时，年过古稀的巢谷复又徒步寻访苏家兄弟，并最终死在了寻访途中。值得一提的是，“二苏重入政坛，官高爵显，巢谷从不问讯”，如此堪称“至情至性于乡野”。

《苏东坡新传》还记录了不少苏轼贬谪时交往当地乡野的有趣故事。比如在黄州，苏轼特别垂涎刘唐人家名为“为甚酥”的自制煎饼，带着家人外出郊游，



《变宋：王安石改革的逻辑与陷阱》
徐富海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都想写诗讨要几块：“野饮花间百物无，杖头惟挂一葫芦。已倾潘子错著水，更觅君家为甚酥。”又如他在儋州，有次行歌田间，一位老妇人对苏轼说：“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苏轼不仅毫不生气，而且往后每次见面都调侃老妇为“春梦婆”。这也正应了林语堂在《苏东坡传》序言里所作的概括：“（他）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街市中的平民

在《宋仁宗：共治时代》里，作家吴钩还记录了一段源自起居注的对话。面对民间酒楼的宴乐之声，内廷宫人十分羡慕地对宋仁宗说：“官家且听，外间如此快活，都不似我宫中如此冷冷落落也。”宋仁宗没有顺着接下话来，而是答道：“汝知否？我因此如此冷落，故得渠如此快活。我若为渠，渠便冷落矣。”宋仁宗的明君形象跃然纸上，与北宋皇宫一墙之隔的喧嚣街市，也从另一个侧面呈现了出来。

澶渊之盟的“红利”，为北宋谋得了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的难得机遇，时人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孟元老



《宋朝人的日常生活》
侯印国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东京梦华录》，都生动记录了北宋市井的鼎盛繁华。以《东京梦华录》中与饮食相关的记录为例：瓠羹店（肉汤店）“上挂成边猪羊，相间三二十边”，不可谓不壮观；饼店“唯张家、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不可谓不兴盛；鱼行“每日如此生鱼有数千檐入门”，不可谓不忙碌。这些场景即便放置于今日，与那些令人趋之若鹜的“网红店”相比，都可迅速“出圈”。

曾经为《东京梦华录》做过译注的文化学者侯印国，还出版过一部《宋朝人的日常生活》。全书的起始之章就名为“吃货”，记载的也正是宋朝令人眼花缭乱的吃食，其中又以夜市小吃为甚。包括侯印国在内的不少学者都认为，是进入北宋后日趋瓦解的坊市制度，间接热闹起了夜幕下的街市。循着《东京梦华录》里描绘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的盛况，以及书中令人眼花缭乱的种种吃食，侯印国挑选其中几种作了详细介绍，比如他提到的旋炙猪肉、煎炒肝脾、观其食材和制作方法，几乎就是“北宋牌”的烧烤和炸物，堪称千年前的“热量炸弹”；又比如当时颇为流行的砂糖冰雪冷元子、水晶皂儿、荔枝膏等等，俨然就是如今各种茶饮、果饮的“鼻祖”，由此



《宋仁宗：共治时代》
吴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可见，被我们奉为“快乐水”的消暑冰饮，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惠及我们的祖先了。无独有偶，写作《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吴钩，也出版过一本名为《好一个宋朝》的通识读物。在书中，吴钩不仅考证出深受老饕欢迎的火腿、刺身、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和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朝”，而且还谈及了“吃喝”之外的“玩乐”，铺陈了北宋街市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元宵节当天，说唱、歌舞、魔术、杂剧、傀儡戏等表演轮番登场，镜灯、水灯、日月灯、马灯等多种灯品各出新奇，就连我们常规认知中“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女子们，也都精心打扮、穿戴戴银，出入于华灯之中，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张生彩鸾灯传》《雨霖铃多情周胜仙》等话本小说，都把佳人相约的故事情境，设置在了元宵之夜的街市上。

北宋大儒欧阳修在《生查子·元夕》里形容元宵之夜“花市灯如昼”。繁华的街市和熙攘的人群，生动展示着北宋一朝富足昌盛、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落灯后，年事毕，“工人收市，工人返肆”，元宵的街市又恢复到了往日，但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北宋的辉煌却仍在继续。

三味书屋

高启：一个天才诗人的英雄主义

■ 戴亚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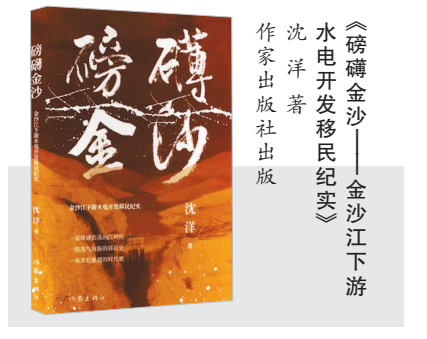


《高启：诗人的穷途》
戴亚伶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高启这句广为流传的咏梅诗影响了后世无数才人，其中就有曹雪芹和毛泽东，但即使毛泽东提名他为“明代最伟大的诗人”，提到高启，大众对他的认知仍然非常碎片化。

关于高启的生平传记，历史上只留下一小段墓志铭。在中国学者的眼里，明代并不是一个诗歌很繁荣的时代，似乎它的文学作品更为突出（四大名著，有三本是明代的）。海外汉学家牟复礼，在明史专家王崇武的启蒙下，开始对这位“小众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传记《高启：诗人的穷途》，就此奠定其在海外汉学界的声誉。牟复礼写高启，不是为了单纯赏析他的诗歌，而是通过诗歌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继而去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海外“汉学界第一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讲座教授杨联陞说，这是一部高启的完整传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于60年前在海外出版，直到2024年才首次汉译引进，经历了严苛的“汉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两个阶段，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好书过眼



《磅礴金沙——金沙江下游水电开发移民纪实》
袁恒雷著
水洋出版社出版

“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高启这句广为流传的咏梅诗影响了后世无数才人，其中就有曹雪芹和毛泽东，但即使毛泽东提名他为“明代最伟大的诗人”，提到高启，大众对他的认知仍然非常碎片化。

关于高启的生平传记，历史上只留下一小段墓志铭。在中国学者的眼里，明代并不是一个诗歌很繁荣的时代，似乎它的文学作品更为突出（四大名著，有三本是明代的）。海外汉学家牟复礼，在明史专家王崇武的启蒙下，开始对这位“小众诗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撰写了传记《高启：诗人的穷途》，就此奠定其在海外汉学界的声誉。牟复礼写高启，不是为了单纯赏析他的诗歌，而是通过诗歌勾勒出他的人生轨迹，继而去理解他所生活的时代。海外“汉学界第一人”，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讲座教授杨联陞说，这是一部高启的完整传记。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于60年前在海外出版，直到2024年才首次汉译引进，经历了严苛的“汉学翻译”和“文学翻译”两个阶段，兼具学术性和可读性。

高启，少年成名，青年成为高产诗人“青丘子”，中年步入仕途，不久后辞官返家。洪武七年（公元1374），苏州知府魏观重建苏州府衙门，被指控改造张士诚旧邸，触怒龙颜，被朱元璋下令处死。高启为魏观的新衙门作《郡治上梁》一诗，其中有“龙庭”“黄堂”四字，被疑是歌颂张士诚，受牵连腰斩，年仅39岁。在高启死后的几十年里，他的生前好友们也被朱元璋陆续处死或下狱，几乎都不得善终。除了高启，元末明初的大多数士人都是差不多的际遇。他们都有为国效力的理想，无奈政权更迭，他们也被迫卷入政治纷争。多数人因此丧命，也有极少数人突出重围步步高升（僧人道衍后来成为燕王朱棣最重要的谋臣，更为人熟知的名字是姚广孝）。

牟复礼着力刻画了一个“英雄诗人”的形象——高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面对动荡的政治局势和生存状况，他所作的人生抉择和所写的诗歌，颇有一种“英雄主义”观念。这里的“英雄主义”跟西方的概念并不相同，牟复礼试图通过诗歌的表达功能（英雄个人在面对这些价值观念时如何进行表达）和现实功能（英雄后人如何将这些价值观念付诸实践），来阐述这些概念。这并非狭隘的个人主义崇拜，而是读书人对国家的责任。他认为，一旦理解了以上这些概念，我们便能够解释诗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面向所发挥的作用，“这是一种儒家英雄式的美德，与西方通常表述里的英雄主义存在巨大的差异。这种英雄主义反映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并且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文价值具象化。”自此，在缺乏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牟复礼将目光聚焦在高启及其朋友的诗歌上，另辟蹊径地把文学作品当作历史材料使用，试图更全面地还原高启，并用“微观历史”的写法提升阅读体验。以诗人传，写出了“一个被迫随波逐流，但也曾尝试努力清醒而独立地活着的天才诗人，拼出了他从青年成名到陨落背后的整个历史图景”。

点亮一汪江水，照耀一方群山

■ 袁恒雷

政策依据，基层干部对移民工作还很陌生，对广大移民无法表态，即使偶尔表态，后来发现与政策又出现相抵触的地方，以至于前期工作非常被动。面对困境，广大基层干部没有气馁，他们不惧风雨，不惧严寒酷暑，不惧乡亲们不解乃至各种抵触，而是对他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耐心细致解释，甚至一度出现“三忘干部”：“忘记了性别，忘记了年龄，忘记了家庭。”

但真正触动广大移民群众的，是这些干部们并不是光口讲政策，而是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并力所能及地为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帮助他们从搬迁区顺利进入安置点生活。比如一名叫柯平的干部讲述了他在分管的老陶的故事就很典型。老陶个子不高，脾气大，嗓门大，找柯平反映的问题主要是自己被征的十亩地建中学补偿标准是每平方米40元，而到了2011年在新址建新集镇征了六亩地，每平方米110元，老陶心里特别不平衡，为此找了柯平十余次。柯平说这是历史遗留问题，政策不一样。但老陶就是不听，以至于对移民工作形成很大阻力。

柯平发现从政策上难以说服老陶，但通过走访了解到老陶家有十多口人，儿子、女儿在镇中学门口煮饭卖给学生们吃，这与学校的管理出现了冲突，但学生

们都爱吃老陶家的饭菜。于是，镇里研究决定，学校设立四个食堂，公开招标，校外摆摊也可以参与竞标。老陶和他的子女中标，进学校办了两家食堂。老陶一家的生计解决了，此时再给他讲解政策的严肃性，他们自然就积极配合。

以柯平为典型的广大移民干部们切实地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为了让广大移民做到“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云南省上下可谓铆足了干劲。比如，在安置区巧家县，政府拨款35亿元，建美丽湖滨旅游县城。整条滨江大道穿过五个安置区，充分体现了水电建设为移民服务的理念，群众满意度非常高。在产业配套上，对移民逐年进行补偿，每人每年可以领到5300多元的补偿，比照最初的水平有所增加。可以说，正是有了这样真正为移民考虑的顶层设计，才有了大移民的顺利实现。广大移民们从最初的故土难离，到搬迁到新居后的脱贫致富，许多人实现了“人挪活”的喜人转变。而一些安置区，也因为移民们的到来变得愈加兴旺。

点亮一汪江水，照耀一方群山。随着四座大型水电站的建成，高峡出平湖的壮美场景在金沙江下游依次呈现，曾经浑黄的江水也变得愈加清澈。

在读

『反正我们是女人吧』

——读《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 戴燕

说来是上个世纪的事。我在京都几次见到中岛碧教授，那时她已同荒井健和她丈夫中岛长文翻译出版了钱锺书的《围城》，又独自译出了杨绛的《干校六记》，对钱、杨作品的熟悉，远在我之上，与她谈现代中国文学，我总是有点心虚，幸好我还可以和她谈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1970年访日日本的一个有名的小说家高桥和巳。她和高桥和巳都是京都大学小川环树的学生，而我们知道，早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出版不久，小川环树就发表过一篇颇有影响的长书评予以肯定。



戴燕，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有《文学史的权力》《洛神赋》九章》等



《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
戴燕整理翻译注释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中岛碧去世也有20年了，未曾想，在吴学昭所编《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里，忽然看到她写给杨绛的那么多信。写于1980年代的信，大部分都是在讨论《干校六记》的翻译出版，到了1990年代，钱锺书和钱锺书相继患病去世，信中除了慰问，也谈到自己。她说她了解杨绛的“苦境”，可是帮不上忙，“心里实在难过”，由此想到自己的“苦处”，在于勉强做了几十年的文学研究和教学，都不适合自己，也就一直做不好，“到晚年心里觉得空虚”，所以，有一次她听杨绛说道：“反正我们是女人吧！”一面体会到其中包含有杨绛几十年来经历过的种种甘苦，一面也得到深深的安慰（258—259页）。在上个世纪，不管中国还是日本，女性学者的人数都非常少，每一个人都仿佛自己领域中的孤岛，中岛碧又是一个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可以想象她承受的压力，也可以想象杨绛这句出于无奈而又带着自我宽解的话，的确让她紧绷的神经放松，因此她后来说想要再见杨绛，“好像想念自己的母亲一样”（286页）。当然，她不知道80多岁的杨绛，那时正处于“每晚服四粒安眠药”的高度紧张中（杨保叙信，408页）。

据吴学昭说，杨绛晚年销毁了许多信件，保留下来的只有《钱锺书杨绛亲友书札》中的这么一些。亲属来信中，有父亲钱基博写给钱锺书的，有姐姐杨寿康和弟弟杨秉燾写给杨绛的，还有堂妹夫许景渊写给杨绛大兄嫂的，有亲情在里面，都弥足珍贵。但更多的还是友人来信，如向达、蒋天枢、王岷源、苏雪林等所写。在友人信件中，来自海外的又数量最大，除了首屈一指的中岛碧，还有德国莫芝宜佳、澳大利亚白杰明、美国葛浩文、斯洛伐克安娜·多雷日洛娃、英国伊夫琳·麦克斯韦尔、日本藤井省三、前苏联索罗金、意大利费忆华等人的来信，他们有的是钱、杨著作的外文翻译者，有的是钱、杨研究者，也有的是在钱、杨访时接待过他们的。在这些来信中，我们可以看到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钱、杨二位在海外有着什么样的影响力，又何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尽管钱

锺书自谓“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卖膏药了”（钱复家洪，51页），在那个时代依然抱“出世”的态度（宋洪信，79页），但是可见，被我们奉为“快乐水”的消暑冰饮，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惠及我们的祖先了。无独有偶，写作《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吴钩，也出版过一本名为《好一个宋朝》的通识读物。在书中，吴钩不仅考证出深受老饕欢迎的火腿、刺身、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和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朝”，而且还谈及了“吃喝”之外的“玩乐”，铺陈了北宋街市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元宵节当天，说唱、歌舞、魔术、杂剧、傀儡戏等表演轮番登场，镜灯、水灯、日月灯、马灯等多种灯品各出新奇，就连我们常规认知中“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女子们，也都精心打扮、穿戴戴银，出入于华灯之中，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张生彩鸾灯传》《雨霖铃多情周胜仙》等话本小说，都把佳人相约的故事情境，设置在了元宵之夜的街市上。

锺书自谓“七十老翁，不宜走江湖卖膏药了”（钱复家洪，51页），在那个时代依然抱“出世”的态度（宋洪信，79页），但是可见，被我们奉为“快乐水”的消暑冰饮，早在千年前就已经惠及我们的祖先了。无独有偶，写作《宋仁宗：共治时代》的吴钩，也出版过一本名为《好一个宋朝》的通识读物。在书中，吴钩不仅考证出深受老饕欢迎的火腿、刺身、汤圆、爆米花等美食和小吃，“都是发明或流行于宋朝”，而且还谈及了“吃喝”之外的“玩乐”，铺陈了北宋街市上令人目不暇接的文娱节目。特别是在元宵节当天，说唱、歌舞、魔术、杂剧、傀儡戏等表演轮番登场，镜灯、水灯、日月灯、马灯等多种灯品各出新奇，就连我们常规认知中“躲在深闺无人识”的女子们，也都精心打扮、穿戴戴银，出入于华灯之中，享受着这一年一度的“民间狂欢节”。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张生彩鸾灯传》《雨霖铃多情周胜仙》等话本小说，都把佳人相约的故事情境，设置在了元宵之夜的街市上。